

作家文库系列

WANGPENG

ZHUANJI WENXUE XUAN

ZHONGGUO DE XIBEI JIAO




王蓬传记文学选

中国的西北角

——多位学人生涯的探寻与展示

(下)

 西安出版社



作家文库系列
王健传记文学选

作者多年探幽发微、寻叩访问，独辟蹊径写出一批历史不能也不应该忘记的大写的人，其中有在修筑第一条穿越秦岭的现代公路中，保护石门石刻的工程师张佐周，有开发大西北的先驱安汉……

中国的西北角

(下)



西安出版社

目 录

路遥的生前与身后	(1)
初识路遥	(3)
获奖前后	(7)
人生点滴	(15)
身后憾事	(23)
巴山茶痴	(31)
初进巴山	(31)
痛失良机	(34)
十年风雨	(38)
福祸并降	(41)
祸因种种	(45)
牢狱反思	(50)
魂系巴山	(53)
负重前进	(56)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作家	(59)
一、困窘的“孤独”	(59)
二、于无声处	(62)
三、理智下的行动	(64)
四、与死神搏斗	(67)
五、贫贱与财富	(72)
六、机遇? 命运?	(75)
七、苦涩的爱情	(79)
八、“真主”昭示	(85)
九、漫漫人生路	(90)

十、学海孤舟	(94)
十一、为了一种存在	(98)
十二、敬礼,穆斯林兄弟	(101)
十三、一本书与一个世界	(105)
十四、高原灵光	(109)
十五、向希望凝眸	(112)
十六、最有希望的时候	(115)
校对过鲁迅先生文章的农民	(122)
困顿家世	(122)
三生有幸	(125)
离乡从戎	(128)
乱世婚姻	(130)
编遣回沪	(132)
重返陕南	(137)
坠入底层	(139)
足慰平生	(144)
台儿庄敢死队队长沉浮录	(150)
一、老人	(150)
二、热血	(153)
三、痛歼	(156)
四、危局	(161)
五、血战	(166)
六、夜袭	(177)
七、大捷	(181)
八、抉择	(186)
九、新生	(192)
十、逆境	(195)
十一、命运	(198)

十二、岁月	(207)
-------------	-------

人物写真

白鹿原下

——陈忠实和他的句子	(213)
------------------	-------

梦回汉唐

——一对扎根西北的学人夫妇	(224)
---------------------	-------

破译“天书”

——著名西夏学专家李范文侧记	(240)
----------------------	-------

留下敬仰

——纪念王汶石老师	(259)
-----------------	-------

巴山汉水是旧乡

——为方济众故居立碑	(267)
------------------	-------

没有放下的鞭子

——为左翼戏剧先驱左明修陵	(275)
---------------------	-------

一位奇人与一本奇书

——古建筑专家卢惠杰情状	(283)
--------------------	-------

一位农民和文学评论

——难忘孺牛	(294)
--------------	-------

一位乡村邻居的命运

——清明忆友	(303)
--------------	-------

一个普通知识分子的沉浮

——怀念父亲	(312)
--------------	-------

后 记	(349)
-----------	-------

路遥的生前与身后



1992年11月17日。

这是一个注定要被牢记又要被诅咒的日子。至少，万里长空增添了一条引发人们感叹悲恸的电波。

新华社西安11月17日电：以小说《人生》《平凡的世界》享誉文坛的作家路遥，今天被无情的病魔夺去了年轻的生命。长期艰辛的创作使他积劳成疾，终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于今晨8:20分在西安西京医院猝然离世。消息传出，人们无不为一位英年早逝的作家扼腕长叹：“太可惜了，太可惜了！”

.....

当晚，陕西电视台在新闻节目中披露了这一消息。古城西安，三秦大地多少人家顿时惊呆，决然不相信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优秀作家竟

遭此厄运！无不喟叹，唏嘘！

隔日，全国各报纷纷登载路遥英年早逝的消息，引起的关切与震动远远超出了文化界。单是笔者就接到远至北京、哈尔滨、西宁、桂林乃至莫斯科的长途电话，纷纷询问路遥死因及善后事宜。

一封封唁电唁函从四面八方飞向西安作协、中国文联、中国作协，全国近百家省市文联、作协、出版社、编辑部。文坛泰斗巴金、冯牧、王蒙、冰心、张光年、秦兆阳、郭超人、陆文夫、蒋子龙、冯骥才、张抗抗、阎纲、周明、邓友梅、白描、白桦……一句句揪心揪肝的话语让捧读者无不泪流满面，一片呜咽：

“文星陨落，痛失良友，贤弟先行，吾随后到 张贤亮”。

“不该走的人偏倒走了，痛哉！请收下后死者的追念，请相信永生者的纪念 公刘”。

“人生苦短世界平凡文坛骁将今又去；相见恨晚辞别匆匆挚友容音梦中还 南京周梅森”。

“路遥你说带我走三边，这事情一年拖一年，总以为时间无限多，谁料想刹那间成了永诀。路遥安息！ 王安忆挽”……

各种缅怀、悼念、回忆文章迭见于报刊，文章之繁多之哀婉也绝对罕见。这是由于路遥辉煌的成就与不幸的遭际，巨大的声誉与难以挽回的结局，可怕的死神与年轻的生命之间形成种种落差在人们心底造成的震荡，不平与回味。

作为与路遥相识相交近 20 年的朋友，许多天心情难以平静，正干着事情，猛一想起，眼皮发跳，心便直沉，许久许久回不过神，而压在桌上玻璃下路遥几张活灵活现、各种神情的照片也让人想起我们相知相交的种种往事。

初识路遥

不少人和不少文章都把新时期文学和文学新人的崛起划定于1976年之后。事情并不那么划一，有一个酝酿准备过程。至少陕西作家群体形成是如此，陈忠实、郭京夫、李凤杰、李天芳、晓雷等人是1965年前后便在报刊发表作品。贾平凹、邹志安、路遥及我都是1973年左右学习写作并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

我第一次见到路遥的名字在1973年7月刚复刊的《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刊登着一则短篇小说《优胜红旗》，写的学大寨的事情。因我当时也在农村、也学大寨，尽管他写的是陕北，我在陕南，事件内容都差不多，熟悉就能记下，关键当时正学写东西，想上报刊，对凡上了报刊的都羡慕，就记住了路遥。

《陕西文艺》是当时全省唯一的正规文学刊物。大家都盯着，一年下来谁发表了什么，几首诗或一个短篇，人都知道，不像现在出部长篇连朋友都茫然。

见到路遥是1975年。《陕西文艺》召开小说作者会，通知了我。那会我已经务农上十个年头。老家西安也十多年没有去了。正在地里劳动，记得是挖红薯，大队会计扬着通知来找我。看着满地羡慕惊讶的目光，我心里激动地“怦怦”儿跳着，几乎抢一样拿过通知，只怕失去了机会，就像目下的人怕去不了美国一样。

委实贫穷，去省城竟然找不出一套浑全衣服。一条好点儿的裤子膝盖上裂了缝，妻子补了个长方形的补丁，穿上看看，不对称，只好又在另一只并未裂缝的裤腿上也补块长方形的补丁，就像目下的牛仔裤。我那会全不顾这些，只要能去省城，去《陕西文艺》开会，就像去天堂一样。给省城的外婆和姐姐扛了一袋子米就去挤火车。



1980年，陕西作家群，左起：京夫、路遥、蒋金彦、徐岳、邹志安、陈忠实、王蓬、贾平凹、王晓新

我是去的最晚的一个。接到通知晚了，晚的原因是大队接到通知后感到吃惊：省上怎么会让一个“狗崽子”去开会？不让去吧，是“省上”的通知，于是折中：让他多劳动几天再去。能够去开会，这得感激作家贺抒玉，她是著名作家李若冰的夫人，当时是《陕西文艺》副主编，还有作家张文彬，她是著名作家杜鹏程的夫人，当时是《陕西文艺》的小说编辑。她们来汉中组稿，听到汉中地区文化馆诗人宋太海与王寅明的介绍来到了我住的村子。由于我父亲还戴着“帽子”，她们没敢去我家，而是在农民诗人蒿文杰家中，然后通知我带上作品去见她们。后来知道是看了作品，她们力争，又经地方党委同意才决定让我去开会的。我那会26岁，与共和国同龄。

会议在西安钟楼下的省文化厅招待所举行，有七八十人。座谈，听报告，然后各自修改作品。当时陕西文坛的明星是陈忠实，他连续在《陕西文艺》上发表了《接班以后》《高家兄弟》《公社书记》，我至今认为那几篇作品有种气势。当时也确实影响很大。再是工人作家韩起有几

篇作品引人注目。其他人都还没显山露水，贾平凹还在写学习雷锋的《一双袜子》，属小不点儿，没人注意他。

路遥当时正在延安大学读书，工农兵大学生开门办学，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当见习编辑。我因为已经读过他写的《优胜红旗》，知道他，况且他现在又当编辑，在我心中有种神圣感。

去了几天都没见着路遥。人都面生不好打问，好在初进艺术殿堂，天天都新鲜，晚上看电影。餐桌上有肉菜，中午还有只鸡，多年在农村哪吃过这些？另外座谈也听着激动。那会陈忠实还当公社书记，他说中午见餐桌上有鸡，就想起带人到农民家中催收鲜蛋任务，有些农民把母鸡刚下的蛋都交了，蛋还是温热的，上面带着血丝。我当时听了心里一阵酸楚，想着还有人替农民说话！

会议主要是修改作品，与会作者各自带着作品，编辑们看了指导着修改，轮流给作者谈话。这在我心里造成种紧张，就跟上考场差不多。

我那次带去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龙春夺阵》，写个返乡青年学当裁缝，用社会主义思想占领农村阵地的故事。散文《春笋岭》是为生产队到巴山深处拉洋芋种所见所闻，放到学大寨背景上来处理。

谁也无法轻易否定事情本身的荒唐性。但历史确实是那么走过来的。当时虔诚得只怕把这类荒唐事写不好。柳青那么伟大的作家也无法摆脱时代的局限，何况我们这些凡夫俗辈！

编辑们终于找我谈话了，就在我住的三人宿舍里。我记得是小说组长路萌，副组长高彬（后来知道她是著名作家王汶石的夫人），屋子里还有其他作者。那会大家都虚怀若谷，求贤似渴，编辑们一张口都瞪大眼睛静悄悄地听着，恨不得把每句话都印在脑子里，似乎那全是金玉良言，能够点石成金。

愈是这样我愈紧张，手足无措满头渗汗。两位大编辑缺点优点说了许多。我并不糊涂，我最关心的是作品能不能发表？

“路遥，你谈谈意见。”

小说组长路萌突然冲着旁边一个壮实小伙说。

什么？他就是路遥！我连忙仔细打量他，个头不高，敦敦实实，脸色黑红，完全像个刚从地里劳动回来的农村小伙。刚才一屋子人，我看过他一眼，以为他也和我一样，是从农村来的作者，没想到他就是路遥。他该是什么样儿？以前也没想过，只觉得他像村里有个叫“扎墩”的小伙，黑胖结实，刁顽而讲义气。每次上公粮扛一两百斤的粮袋从不怯场，且最爱给人帮忙。谁力气怯只要求他，几句好话就能帮着把一架子车粮袋扛完。

路遥要在村里，也注定有人叫他“扎墩”，他也注定扛得动粮袋。说不上也肯给人帮忙。只是不知这会他对我作品咋看？

我紧张地看他，他先看了我一眼，随即目光又朝下，我疑心他在看我膝盖上的补丁。谁知他用一口浓重的拖着鼻音的陕北话说：“这两篇作品还有生活气息，语言也生动，再改也没多大意思，我看通稿时顺一顺就能用。”

“那就这样吧。”

两位小说组长略沉思了一下也同意了，气氛一下松弛下来。满屋子的人扯起了闲话，扯起了那些年人最感兴趣的“小道消息”。我心头感到一阵轻松，没想到如此顺利地过了关。后来这两篇作品分别发表于《陕西文艺》1976年3期和4期。作品第一次上本省正儿八经的文学刊物，除了感激所有帮助我去省城开会的人，也很感谢路遥，感谢他在关键的时候帮我说话。当时没有什么感谢办法，只是想要在农村上公粮，我能帮他扛粮袋。

过后，陕西省在汉中召开全省革命故事调讲会。路遥那时已大学毕业，正式调进了已经恢复的《延河》编辑部。来汉中组稿，在会上找我。我与路遥已经见过面，有过交往，就很自然地接触较多。

也就是那次，路遥对我说，上次去省城开会，他见我穿着打补丁的裤子，再一看模样就知道是从农村来的，就有种天然的同情和好感，就本能地想帮一把。他说他家在比陕南农村更贫穷更严酷的陕北农村。曾经连我那种带补丁的裤子也穿不上，饿饭更是常有的事。

尽管他没有讲更详尽的情景，我顿时感到拉近了距离，有了一种天然相通的东西。我对他支持帮助我作品上《延河》有了种透彻的理解。只有经历过苦难的人才富于同情心。善良和宽厚绝对不是谁想有就能有的，那绝对是一个人血缘环境，生活经历形成的溶进骨髓里的东西。

也是那次，他问我对生活有什么打算？那会虽然已经粉碎了“四人帮”，但父母的冤案尚未平反，我还是一个整天用最原始的劳动工具挣工分养家糊口的农民，虽然发表了些作品，小有影响，但还看不出有离开黄土地的希望，而这一切又绝非我个人的力量所能改变。

“我们这些人首先要靠自己的奋斗和努力真正干出了成绩，愿意帮忙的人才好替你说话，现在就要有这种想法和目的，而人是有了目的才会锲而不舍地奋斗……”这些话无疑给我壮了胆，使我心中那些朦胧的念头变得明晰。关键是这么一个从更艰苦更贫瘠的土地上奋斗出来的农家小伙就活生生地站在面前，这对我的影响可以想见。

这次接触，还算不得深谈，但彼此都加深了了解，发现了许多相同相通的东西。关键还是我们共同喜爱文学，这就有话可说，而交谈中又绝不仅仅是交流了对文学的看法，而是互相了解了对方。至此，我们成了朋友。

获奖前后

客观地说，陕西文学的崛起，陕西作家群体的形成，1980年夏天的太白会议起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陕西文坛解放后就因为有胡采、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王宗元、李若冰以及他们创作的一批作品被誉为中国的文学大省。这种传统、土壤、氛围必然要对后来者产生影响,1978年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评奖,陕西就爆出绝响,贾平凹的《满月儿》与莫伸的《窗口》榜上有名,在全国获奖。那时不像现在对谁获什么奖都麻木。那时获一个短篇小说奖就不得了,真正一跃龙门,身价十倍,电视报刊介绍,编辑纷纷约稿,再加上成千上万文学青年的拥戴,一时间也产生出偏差,对待一个作家,不是看其生活积累、艺术修养、写作功力如何,而是看其是否获奖。甚至连办刊物都是如此,刊物好坏,就看刊物登的作品获没获奖。不止一家刊物到处活动着获奖,也不止一个作家刚想到一篇作品的题目就想着获奖,围绕获奖产生过多少一波三折,又啼笑皆非的故事!

但不管怎么说,只要你写作,只要你涉足中国文坛,你还是得获奖!不然,不仅任何好事轮不到你,连你自己都怀疑是不是真是在文坛混饭吃的角色!

开始压力最大的是陈忠实,大家一直把他看成后起者的主力,如今平凹、莫伸两位小兄弟都领了先。有一两年忠实很沉默,埋头读书。

路遥那会在《延河》编辑部,只能业余写作,在一些报刊上发表了短篇小说《不会做诗的人》《夏》《青松与小红花》,但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效应”,听说他写了一部中篇,寄了几个编辑部,都退了回来……

路遥表面沉稳,内心争强好胜,他面临的压力是明显的。

能不能保持住势头?能不能继续获奖?保持住文学大省的美称,在“湘军”“晋军”的不断崛起中,整个陕西文学界都感到压力。

检讨成果,评论优劣,挖掘潜力,组织队伍便成为当务之急。刚刚恢复正生气蓬勃的陕西省作家协会非常及时有效地抓了这项工作,1980年盛夏,在凉爽的秦岭太白县城举行了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

作协主席胡采,《延河》主编王丕祥,评论家王愚、李星、肖云儒、大



学教授蒙万夫,再就是小说作者了,当时还没人敢称作家。来的有陈忠实、郭京夫、路遥、贾平凹、邹志安、王晓新、蒋金彦、徐岳等。

我那会仍在农村务农,是参加会议唯一的农民。记得是收罢了小麦栽上了秧子去的太白。

那次会议开得过硬,每人带上自己已经发表的代表作品,互相传阅,然后一个作者一个作者地讨论,先自己谈,完了大家评论,议论不足,分析失误,相当扎实。

会议气氛也好,大家开诚布公,不论对谁都提出一大堆建设性的意见供你参考,确实启迪思维,有茅塞顿开之感。



青年时代的路遥和著名诗人
谷溪摄于黄河畔(1970年摄)

会议期间,还组织了几次参观游览,太白县便在秦岭岭顶,谁能想到这是块近百平方公里的高山平原,著名的古褒斜栈道由此经过,盛唐时曾是大将郭子仪的养马场,水草丰满,森林茂盛,盛夏也凉风习习,十分适意,保证了大家在情绪上的心平气和。

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逛原始森林,几辆汽车沿着飘带一般绕缠于秦岭山巅的山区公路行驶,越盘越高,起伏的山峦像大海波涛扑向天边。路遥、京夫、王晓新和我乘坐的一辆吉普车,车速较快,没多久就把后边的面包车甩下好远,车驶上山巅,钻进一团乌云,不想大雨倾盆,铺天盖地,只听山林发出排山倒海般的呼啸,大家都有些心惊,怕山洪

把车冲跑，一直沉静的路遥却欢呼起来，并说他喜欢暴风骤雨，车子在暴风雨中飞驰是种享受。司机担心大雨浇熄了火要出危险，敏捷又迅速地就把车退出了云团。

实在奇妙，转了个弯，近在咫尺，却又万里无云，一派晴空，公路上扬着灰尘，丁点雨都没落。折腾一番，饿了，找出车上装的罐头正要吃，老实的京夫担心：“后边车上人来了要吃咋办？”

“不要紧，就说昨天晚上就让贾平凹偷吃光了。”机警幽默的王晓新出着鬼点子。

“而且，他还把我们这些都贿赂收买了，不让我们向胡采同志报告。”路遥也兴致勃勃地加入了合谋。

本来，我以为路遥面临挑战，压力太大，情绪心境会受影响，他不像我仍在农村，即便没有获奖，人们也能原谅。他在作协，担任《延河》小说组副组长，身处漩涡中心。况且，大家都看出路遥决不甘心一辈子为他人做嫁衣裳。他胸怀大志，雄心勃勃，是那种注定要干番事业的人。但事业再伟大，也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搞文学就要看作品。路遥那个时期的作品我都找来看过。因为我那会也想突破也想获奖，呆在陕南乡村瓦屋里，下地干活回来，就成夜研究获奖者们的作品和陕西同行的作品。凭我的感觉就觉得路遥的作品获不了奖。

因为那会获奖的作品一部分是因为题材尖锐突破了禁区，造成远远突破文学圈子的社会影响，即“轰动效应”；另一部分也确实厚积薄发，堪称力作。各方面都涌现出高手，比如张贤亮写知识分子蒙难的《灵与肉》，张弦写爱情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古华写山林生活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张一弓写农村题材的短篇，蒋子龙写工业题材的短篇等，也确实干了些绝活。

路遥那个时期的几篇作品《夏》《青松与小红花》，写知青生活的，既不算“禁区”，写法也较传统，尽管字里行间不乏路遥式的幽默，看了

并不震撼，并且隐约感到他写得很艰苦，让人看时都替他捏把汗，似乎是硬憋出来的。我猜想这一定是他最难受，最苦闷的阶段。来时，我就怀着一种说不清目的的想法，想跟他聊聊，为他也为我自己。

可是，却没有机会，也缺乏一种氛围。会议住招待所平房院子。大家都住后院，路遥独自在前院一间房中。我去看他，他说夜里睡觉打呼噜怕影响别人。我疑心这半是理由半是借口，因为我知道路遥不喜欢热闹，爱安静的读书或沉思。当然后来也发现他也喜欢畅谈，但那必须是互不设防的挚友，环境情绪所致，才能谈得起来。

他枕边放了一垛书，有《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等，我想起他上次到汉中组稿，好像也是带着这些书。我于是知道他偏爱名著，尤其俄国名著。恍然感悟，一个沉浸在大师们建造的恢宏的艺术殿堂的人也许对中国文坛眼下的喧嚣并不在意，或是正胸有成竹，从大师的论著吸取营养、打磨武器，等待着一个有利的时机再突然出击，一鸣惊人。

不知为什么，我深信路遥心灵深处怀着这样的念头。对于这样一个胸怀鸿鹄之志的人任何关于事业上的规劝、安慰之类的交谈都属多余浅薄。

我于是扯些别的。路遥也问些我种庄稼的事情。但我仍从他情绪中感到以一种压抑不住的昂扬，决不像处于低潮或情绪灰暗的模样。莫不是他遇到了什么转机？而且注定和事业有关。这种推测几天后得到证实。

招待所后边便是座可以俯瞰整个太白县城的山峦。几个下午，大家都结伙爬山。有天路遥也去了。他那时已有些发胖，落在后边。我本来性急，可见他掉在后边，不好意思先走，于是陪他，爬到山半腰，有些气喘，索性不走了。两个都躺在青草如毯的山坡上，晚霞如火，山风徐来，十分舒坦。



“你最近写什么？”路遥突然问我。

“写一位猎手的故事。”

“我看你对山林生活很熟悉，最近这两篇都不错，你在这方面还可以再挖掘，写篇真正能打响的东西。”

路遥说的两篇作品是指我刚才在《人民文学》1979年11月号上的《批判会上》和《延河》1980年元月号上的《猎熊记》，前一篇被翻译到美国，后一篇《延河》选发了评论。我也是感到这两篇作品才真正写了我熟悉并有所感悟的生活，写作时有一种真正创作意义上的冲动。

“我有一部中篇马上要在《当代》上发表。”

路遥说这话时，眉眼语气有一种掩饰不住的激动和兴奋。

“是不是那部写‘文化大革命’的？”我前几天便隐约听谁说过。

“可不是啥，娘的，两年了，寄了十几个编辑部全退回来，这回是秦兆阳同志看了，亲笔写的信，让我去北京改稿，下期就发……”

“什么，秦兆阳！”

我也被这消息激奋起来。因为对秦兆阳并不陌生，上初中就读过他的长篇小说《在田野上前进》，现在担任中国最权威的文学刊物《当代》主编，他若对哪个作家的作品赏识，注定会改变哪个作家的命运，尤其对那些正在苦苦奋斗挣扎的青年作者来说更是如此。

路遥写的这部中篇小说尽管还没有阅读，但是我深信秦兆阳的眼光，能亲自写信让路遥赴京修改，足见重视。说不上是一部能够打响的作品，那么路遥这多年苦苦的奋斗与追求就会有结果……这么想时，只觉得前景如同晚霞一般绚丽，无怪一向深沉稳重的路遥这么高兴。

后来的事实是：路遥这部题名为《惊心动魄的一幕》的中篇小说先是在《当代》发表，接着荣获全国第一届中篇小说奖。那正是获奖最红火最荣幸的年份。这使路遥作为一名文学新人在全国范围获得了认可。各编辑部铺天盖地的约稿与苦战告捷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他的信心。